

【编者按】

有关苏富比拍品苏轼《功甫帖》真伪的争议成为了2013年岁末的文化焦点。媒体竞相引述上海博物馆观点,或刊载各类学术争鸣,却始终未窥全豹。

在2014年新年首日,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三位研究馆员公开发表了共同研究成果。本报第一时间辑录了这两份备受瞩目的“学术研究报告”,为连日来的争议提供完整的参考依据,也供关注此事的读者继续探讨。

“双钩廓填”之法,一般而言,系覆透明薄纸于书画原作之上,先以墨线勾勒轮廓,再以纸绢于稿本上钩摹,墨线勾好后,再染墨敷色。以书法为例,具体而言,即以细线双钩轮廓于纸绢上,可深可淡,再填墨;或用影摹手法,将双钩稿本垫于纸绢之下,在纸绢上或摹写、或钩摹结合。上述手法,均以原作双钩轮廓为依据,故称“双钩廓填”,作品谓“摹本”或“钩摹本”等。

“摹本”最初主要用于复制古代名家原作,旨在保护原迹,以及易于传播流行、临摹学习等功用。此法盛于唐宋,并以精妙著称于史。如宋濂(1310-1381)称:“摹书至难,必勾勒而后填墨,最鲜得形神两全者,必唐人妙笔,始为无愧如此。”(题虞世南《兰亭序卷》,故宫博物院藏)王穉登(1535-1613)亦曰:“宋人双钩最精,出米南宫(米芾)所临,往往乱真。”(题《快雪时晴帖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由于文物散佚的原因,古代法书名画尤其是唐以前墨迹,原作大都无存,故即便为唐宋摹本,往往可视为重要文物,甚至是国宝,如著名的唐摹王氏一门《万岁通天帖》(辽宁省博物馆)、唐冯承素摹王羲之《兰亭序》(故宫藏)、唐摹王羲之《上虞帖》(上海博物馆藏)等。其中被视为国宝的唐宋摹本,一般皆具有以下特点,一是摹自真迹原作,二是善书名家亲为。如陈方所言:“钩填摹揭之法,盛宋时,惟米南宫、薛绍彭能之。盖深得笔意者,然后可以造化,否则用墨不精,如小儿学描朱耳。”(题陆继善《行书唐摹兰亭序册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,以及沈荃(1624-1684)“加以善书之家,钩填精妙,几欲乱真”(同上)、董其昌(1555-1636)“下真一等”(题《万岁通天帖》)等精辟之论。

明清以降,“双钩廓填”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。对此,嘉庆间萧山文人王端履于其《重论文斋笔录》中曾就晚清钩摹作伪现象一针见血地予以揭橥:“近来市贾所售墨迹,多从法帖中双钩。”“从法帖中双钩”,实属与上析唐宋依据原作钩填之性质同中有异的另类手法。兹以上海博物馆所藏苏轼《刘锡敕》伪本、以及今年于纽约所见的《功甫帖》墨迹为个中实例典型试作剖析。在此需要说明的是,对于两帖钩摹本制作的具体时间,目前可能存在不同看法,笔者的深入研究也在持续进行,本文拟将其中一种看法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如下,以祈教于方家。

《功甫帖》墨迹本与《安素轩石刻》

对《刘锡敕》伪本之研究,十分有助于对《功甫帖》墨迹的鉴别,二者且可相佐互证。这两件百余年前就在一起、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的墨迹,其钩摹性质竟如出一辙。

《功甫帖》墨迹,纸本,纵27.9厘米,横9.5厘米,书“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”九字。原与《刘锡敕》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,亦属李佐贤《书画鉴影》中《苏米翰札合册》之一,至民国三十一年(1942),包括米芾《道祖帖》《章侯帖》等在内的《苏米翰札合册》中各札,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。

许汉卿旧藏《功甫帖》墨迹现改为轴,据本轴许氏自跋,知应为其于1954年重裱所为。重装时,其情形与手法犹如《刘锡敕》伪本,许氏也另行增添了其从英和后裔处所获的翁方纲《钩摹功甫帖》油笺本,以及款署“翁方纲”题跋,连同许氏本人题署,共计四页,合裱成一轴。

(一)《功甫帖》墨迹本钩摹自《安素轩石刻》

苏轼《功甫帖》被模勒上石,最早见于徽籍儒商鲍漱芳(约1763-1807)辑刻的《安素

“从法帖中双钩”

——析《刘锡敕》《功甫帖》墨迹钩摹的性质(上)

◆ 钟银兰 凌利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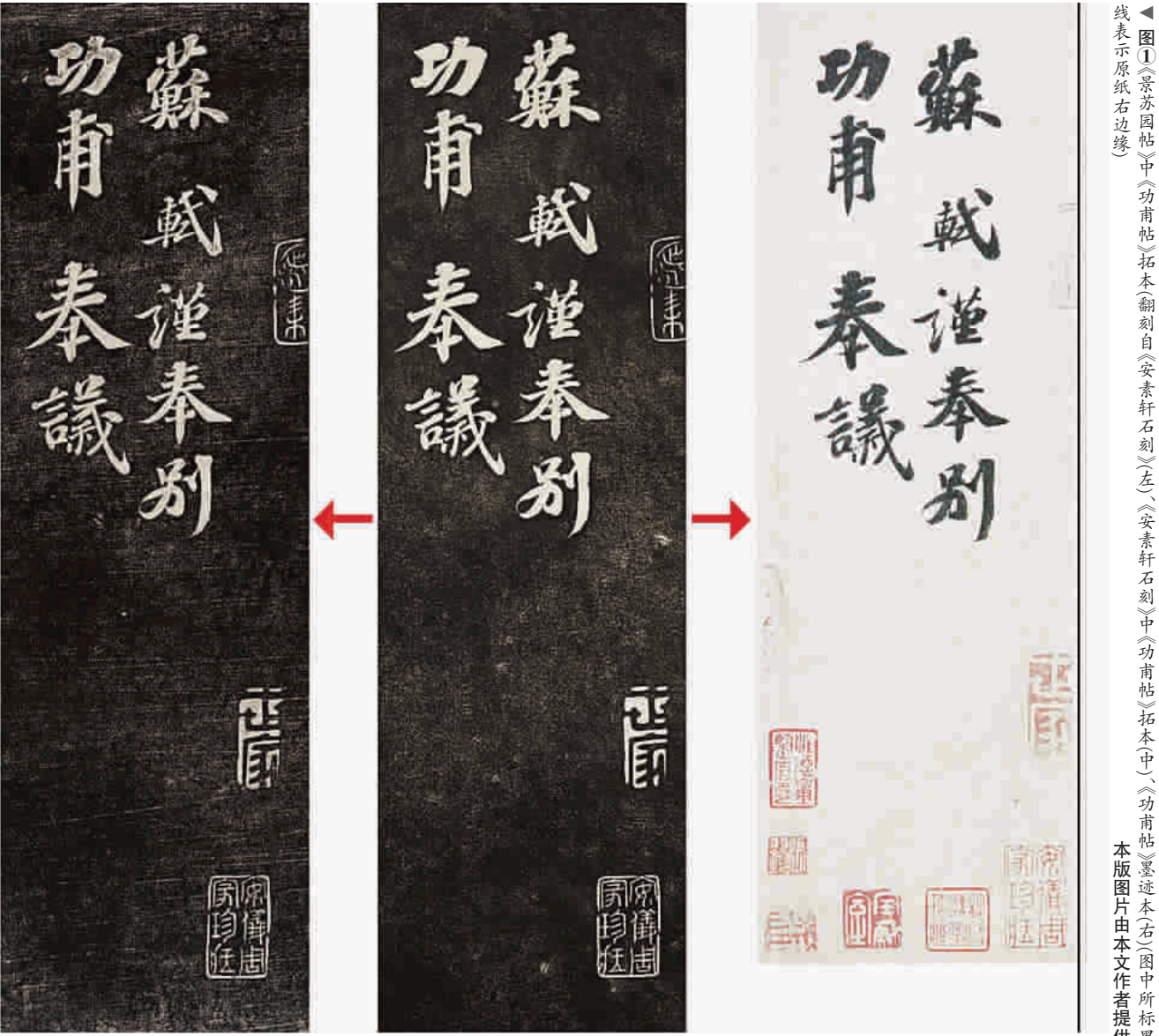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《景苏园帖》中《功甫帖》拓本(翻刻自《安素轩石刻》中《功甫帖》拓本中)、《功甫帖》墨迹本(右)图中所标黑线表示原纸右边缘
本版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



图2《道祖帖》墨迹(左)、《安素轩石刻》拓本(右)
图3《景苏园帖》拓本(上右二)、《安素轩石刻》拓本(上右一)、《功甫帖》墨迹本(下右二)、《安素轩石刻》拓本与“墨迹本”叠影(下右一)



轩石刻》(上海博物馆藏)。该石刻共计十七卷,系鲍氏自嘉庆元年(1796)从其家藏古代法书原迹中,辑选唐宋明五十件,自嘉庆四年(1799)至道光四年(1824),分别由扬州篆刻家党锡龄、鲍氏二子治亭、约亭陆续精心钩摹上石。鲍氏家藏,多有名迹,如唐人《郁单越经》、李邕《出师表》、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苏轼《楷书祭黄几道文卷》以及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苏轼《行书春中帖》(亦名《与德孺运使书》)等名品赫然在列。而李佐贤《书画鉴影》中著录、后为许汉卿如获至宝的米芾《道祖帖》、《章侯帖》两件名品均来自于鲍氏“安素轩”旧藏,且二帖皆经鲍氏辑选刻入《安素轩石刻》。需指出的是,鲍氏所藏,其间亦不免掺入少量赝品,评者如石韞玉(1756-1837)、张伯英皆有专门指出,如“盖嗜古而疏于赏鉴者”。然而,对鲍氏“唐帖临本及前人石刻本不复招入,重

墨宝也”之精神,以及帖中所收大量名品真迹之事实,则无不给予充分肯定,如“悉依墨迹,不参以石,其他所刻犹多,则不列入此编。鲍氏徽之盐商,寄居扬州,刻石均在维扬,洪杨劫后,石遂散佚,今全帙罕有矣”(张伯英语)。此帖之价值,可见一斑。光绪十八年(1892),成都杨寿昌出资,星悟杨守敏(1839-1915)辑选古代法帖,刘宝臣手摹上石刻成《景苏园帖》(中国国家图书馆藏),其中苏轼《功甫帖》系从《安素轩石刻》中翻刻而来【图1】。

《安素轩石刻》(上海博物馆藏)共收苏轼书作六件,其中有两件张伯英指出为伪,其余《功甫帖》《楷书祭黄几道文卷》《与德孺运使书》及《与质翁朝散书》等四件皆真,历来不持异议。这四件原作墨迹中,除《功甫帖》不见传世外,另三件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等处。

如前所述,古代摹本之佳者,皆“几欲乱真”。然而,钩摹者即便为“深得笔意”之名家如虞世南(558-638)、冯承素、米芾等,钩摹再精,亦只能“下真一等”。诚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题苏轼《新岁展庆帖卷》曰:“东坡真迹,余所见无虑数十卷,皆宋人双钩廓填。坡书本浓,既经填墨,益不免墨猪之论。”换言之,凡摹本,其丰韵神采与母本相较总是见拙,尤其是在古代技术条件下。石刻拓本与墨迹母本之间的关系亦然【图2】。以此检视《功甫帖》墨迹与《安素轩石刻》中所收《功甫帖》拓本,其间关系是十分明确的,即现在这件《功甫帖》墨迹(以下简称“墨迹本”)不是鲍氏据以模勒上石的家藏原作,而是钩摹自《安素轩石刻》之“拓本”(纵32厘米,横8.5厘米,以下简称“拓本”)。现举证简析如下:

(下转第18版)